

传统庙会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

——以绍兴舜王庙会为个案的讨论

袁瑾

(杭州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杭州 311121)

摘要: 近年来, 传统庙会作为彰显地域文化特色的公共型文化活动而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传统庙会的复兴不仅重构了民众的信仰生活空间, 也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提供了具体的情境与时空。活跃于绍兴会稽山区的舜王庙会无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庙宇群落、会社组织、群体心理认同, 相互交织, 共同构成了其极具向心性的稳定空间形态。从空间的地理承载、基本结构和公共精神3个维度入手, 对舜王庙会历史形成的传统空间结构进行剖析, 通过梳理基本特征讨论现代转型, 以实现传统文化在传承中的保护与发展。

关键词: 传统庙会; 公共文化空间; 传承; 保护发展

中图分类号: K892.24 **文献标志码:** A

The Traditional Temple Fai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Space

——A Case Study of Worship of Shun in Shaoxing

YUAN Ji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temple fairs have been highlighted as rural public cultural activities full of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recent years. The renaissance of traditional temple fairs not only helps to reconstruct the belief space but also provides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e with specific context, among which the Shun temple fair in Shaoxing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Temples, mass organizations and group cultural spirit identity on affection and belief of local people, the three parts comprise a stable public space which is full of centripetal force. From the aspects of geographical carrier, space structure and public spirit, it expresses the idea of public space in sense of modern Sociology and fulfills the idea of protecting in the process of inheritance.

Key words: traditional temple fairs; public cultural space; inheritanc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庙会是一种围绕着神灵祭祀而展开的群体性、周期性民俗事象, 它在一定的地域内发生, 由特定的人群组织, 并具有很强的传承性。庙会的习惯称呼也很多, 或称庙市、香市、香会、神会等等。与纯粹的宗教祭祀仪式不同, 庙会是社群民众公共生活的中心, 它是庙宇建筑、神灵信仰、仪式、文艺表演、商贸集

市、传说故事等诸多因素组合而成的综合体。

近年来,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 各地的民间庙会活动也逐步恢复, 并且有日益壮大的势头。在各地的实践中, 传统庙会活动经常被打造成地方性文化节等公共文化活动, 从而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存在和表达形式, 传统庙会

作者简介: 袁瑾 (1979-), 女,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学。E-mail: yuanjin@hznu.edu.cn.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课题“传统庙会与新农村文化建设: 以浙江位个案”(13YJC840045); 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中心课题“地域民间信仰与乡民艺术: 以绍兴舜王庙会为个案”(13JDYW03YB)

与现代生活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立或者断裂，而是不不断延展的生活空间中的连续平面。因而增强其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是当下寻求民族文化延续，保护地域文化特殊性的必由之路。将具有民众基础、地域特色、符合当地民众审美习惯的传统庙会纳入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推动具有特色的美丽乡村发展，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民众和文化工作者的认同。

传统庙会，特别是区域型庙会的复兴，不仅重构了民众的信仰生活空间，也为乡村文化融入现代城乡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提供了具体的情境和空间。本文以活跃在绍兴会稽山区的舜王庙会为个案，讨论以传统庙会为中心形成的公共文化空间的基本特征、构成要素以及其在现代转型中面临的挑战。

1 公共文化空间的三个维度

会稽山位于浙江绍兴北部平原南部，这里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历代帝王加封祭祀的镇山之一，被称为“南镇”。这一带山林茂密、雨水充沛、气候宜人，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由于山区交通不便，村落分布比较零落，经贸商业活动不甚发达，生活比较闭塞。然而神灵信仰却十分普及，舜则是这一带民众共同供奉的神灵。传说舜曾巡守会稽山，出于对他的德行与造福一方功绩的敬仰，当地民众就把他神化了。有了关于舜的种种神灵传说，并在会稽山区建起了一座座舜王庙，用来祭祀舜王，其中最大一座就在双溪江舜王山上。信奉舜王的民众在这里朝山进香、举办巡会，历时近百年，形成了稳定的村落联合型公共文化空间。

公共空间，是现代社会科学较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大批思想家投身其中，哈贝马斯无疑是最具典型性的代表。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空间是公共领域的载体，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于国家和国家所无法触及的（私人）社会之间的空间，资产阶级所代表的市民阶层可以自由地、集体地参与公共事务，形成近似于社会舆论的一致思想，从而维护总体阶层的共同福祉。他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提出在政治性权利之外，建立一个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空间^[1]。哈贝马斯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后者所说的公共空间主要指的是人与人之间通过直接交往而形成的平等对话、共同参与的政治空间。

中世纪的城镇广场是其典型的代表，资产阶级

兴起后的沙龙、咖啡馆等聚会场所亦可纳入其中。作为西方政治社会学概念的公共空间，其内涵和外延并不完全适用于我们所讨论的现代村镇地域范围内的公共空间，但它提供了3个基本的视角：空间载体、人际交往和公共精神。

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公共空间的讨论多集中在城市，进入21世纪以来，乡村公共空间的问题逐渐引起了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等领域学者的兴趣。社会学者特别强调特定空间内的社会组织与公共精神的培育。村落公共空间被定义为“社会内部业已存在着的一些具有某种公共性且以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2]。村落公共空间，首先是一个公共场所，人们可以自由进出并进行思想交流，其次是空间内要存在稳定的社会组织以及相关活动形式，“体现中国农村社会的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反映出当今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多元化的公众自觉精神”^[3]。由此寺庙、祠堂等被认为是典型的村落公共空间，其中一大批习俗、歌舞表演、手工艺、曲艺、仪式活动等丰富的民间文化积累，则成为目前乡村文化开发的重要资源。

人类学民俗学者常常用“祭祀圈”和“信仰圈”之类的术语来描述与庙会活动相关的地域和组织。总的来说，二者都以祭祀神灵和庙宇为经线，研究者一般以信仰组织为纬线，通过仪式活动沟通经纬，展开共时性的人群与地域研究，从而在社会发展史的脉络上，探索此类信仰共同体形成和存在的意义，解释历史何以造就现实。

另一些学者则从庙会活动与基层社会空间的关系入手，研究建立在血缘或者地缘关系上的信仰组织，是如何通过庙会相互交往，进而影响村落生活秩序的^[4]。而那些有关灵迹的传说暗含了民众对自身生活空间的想象与建构，是他们对村落历史群体性记忆的叙事性代表^[5]。庙会不仅仅是信仰与祭祀，它还具有地域经济、公共娱乐、社会交往等方面的作用，对当地民众群体意识的构建和强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此，不论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还是当下活跃着的社会文化事象，庙会空间的研究都需要被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学研究图景中，梳理传统，理解当下，契合未来。从此角度出发，本文从空间的地理承载、基本结构和公共精神3个维度入手，立足于传承与发展，对舜王庙会历史形成的传统空间结构进行剖析，通过梳理基本特征讨论现代转型。

2 三个维度的内涵

2.1 庙宇建筑：空间的地理承载

庙会围绕庙宇开展，庙宇是庙会活动的中心，有庙才有会。影响较大的区域性神灵在其信仰圈内会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庙宇群，其中历史悠久的大庙，因其在信众中享有较高的声誉，香火最盛兼之地理交通之便而成为中心庙宇，或者称为总庙。围绕总庙，周边村落通常建有各自的村庙，供奉主神的身分或者亲属神，成为下位分香庙宇。总庙与村庙连接，划定了庙会空间的基本地域边界。

舜王庙会以双溪江舜王庙为中心，辐射周边十几个村落。从地理位置上看，双溪江舜王庙虽然坐落于会稽山区，但正好处于小舜江水系。小舜江全长73 km，为曹娥江下游最大支流，旧时是山区主要的物资运输线。物质在此中转，往东进入曹娥江，再由大运河运往杭州、上海等地。庙会期间，往往会吸引远近商贾汇集于此，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临时性集市。旧时山区比较闭塞，虽然平日里也有一些货郎挑着担子穿梭于村落之间，村落之间并未形成集市，因此这里的庙市就格外吸引人。当地有俗谚：“平水岳庙六月十九箩箬会，双溪江舜王庙九月廿九缸髻会”，讲的就是庙市上缸髻、陶器等农家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数量多、品种丰富。

关于这座总庙的建立，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说清代咸丰年间，舜王菩萨托梦给当地一位江湖术士要在此山上建庙。后来当地乡绅便出资修庙^{[6]123}。伴随着庙宇的建造，当地还流传着不少有关庙宇建造的灵异传说。这些传说凭借丰富的叙事形态，以“历史”的姿态为现实的存在提供合理的解释，并对民众产生心理暗示，强化他们对祖庙正统性的认可。

以双溪江舜王庙为中心，会稽山区还分布着不少村落级的庙宇，一村一庙或几村联合建一庙，供奉舜王以及舜王的亲属神灵。目前尚存的以“舜王”或者“大舜”命名，直接供奉舜王的村庙大约有20余座，分布在周边王坛镇、稽东镇、平水镇、谷来镇、上虞市、福全镇的几十个山村中。关于这些村庙的起源来历几乎没有确切的历史记载可考，从相关的传说以及所奉神灵入手，大致可以分为3类：分身庙、神迹庙和亲属庙。

分身庙，即所供奉主神的身分神灵的庙。至于神灵如何分身，当地有“抢菩萨”的故事，说的就是分别位于湖墩村、塘里村、诸暨枫桥村的3座舜

王庙分身庙的由来。说有一年舜王巡会，因当时主持仪式的头社迟到而引起了一场争执。结果菩萨被众人抢夺，湖墩村抢到了菩萨的头，塘里村抢到了菩萨的一双手，诸暨枫桥人抢了菩萨的内脏，只有菩萨的正身还留在王坛舜王庙里。人们相信，菩萨身上的一部分即便离开了菩萨的身体，也具有与菩萨真身同等的神力。因此这3个村子的村民便各自建了舜王庙，供奉菩萨，3座庙宇也就成了神灵的分身庙宇，每年要到双溪江来续香火。

神迹庙主要是依据传说中舜在会稽山区活动所留下的遗迹而建起的庙宇。当地流传着数量庞大的舜王传说群，形成了一个从出生、接受考验、成为帝王、最后归葬的完整故事框架，舜王所到之处都留有遗迹。这些地方的民众往往感其恩德，修建舜王庙。比如上虞冯浦村原有一座“渔浦庙”，当地传说即为舜捕鱼处；嵊州与绍兴县交界处有谷来村，建有舜王庙，相传此处为当年舜耕田，天降稻谷地。

亲属庙，主要供奉主神的亲属神灵。据俞日霞、俞婉君2位学者调查，会稽山区目前仍尚存约10座舜的亲属神庙。所祭神灵主要包括舜母娘娘、舜的岳父尧、舜的娘舅永兴菩萨和白鹤大帝、舜的弟弟象，黄帝轩辕氏也因是舜的先祖而得以立庙受祭^[7]。

总庙与下位村庙之间主要通过祭祀活动相互联系。舜王庙会活动分成常规性的朝山进香与不定期的巡会2种。常规性的朝山进香主要维持日常的信仰联系，并有寺庙之间相互联络，互通消息的作用。定期性的庙会热闹得多，若举办巡会则更加隆重。巡会，又称为迎神赛会，通常指抬着神像按一定路线巡游，并形成浩大的队伍，其中往往包括各种民族民间艺术的展演。

主神出巡有固定的路线，但也会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整。通常包括其下位村庙所在的大部分村落，并以几个规模较大的村庙为落脚点，解决饮食和休息问题。巡会之际，相应村落需要在村中舜王庙，或村口交通要道设立“供棚”，备五牲福礼、香烛供桌，并由专人迎候巡会队伍的到来。队伍到达后，循例祭拜一番，称为“驻马”。若是队伍越棚而过，则会被该村视为奇耻大辱，往往因此引起纠纷。若夜晚神像当晚在村庙中过夜，是夜庙中要拜忏祭祀，并唱绍兴大戏，而远近村子的男女老少都会过来凑热闹。

巡会旨在让神灵巡视辖区，宣示主神身份，并沿途驱鬼除秽、保佑平安，周而复始地加强、巩固

作为庙宇之间区域共同体的联系。巡会中又有各类民间艺术表演，俨然是一个移动的文化舞台，为文化生活相对闭塞的传统山区民众带来极大的精神享受。

2.2 会社组织：空间的基本结构

现代社会中，公共空间相对于私人领域的住宅、工作等场所而言，具有开放性。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可以根据其生理和心理上的可进入性来判断，即不需要凭借某种身份，个人就可以直接进入，并形成对集体的认知。公共空间的稳定有赖于特定地域范围内相对固定的人际交往方式与人群组织，人们通过一定的组织方式开展交往活动，从而获得对整个空间结构的印象。就舜王庙会而言，民众自发组成的组织称为“会社”。会社是民众参与庙会活动，进行人际交往的基本组织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化、模式化的行为方式，构成空间内部的稳定结构。

会社分为“社”与“会”两级组织单位，它们因庙而设，既与村落、宗族有着密切关系，又不局限于此，是一种跨血缘的地域合作性组织。

“社”是掌管庙会事物的常设机构，主要承担仪式方面的组织工作，比如确定庙会的日期、巡会的路线、物质供给、村落排序等。在当地，社大小不一，有一村一社，也有几个村落联合共建一社。王坛、稽东一带同村一姓或几大姓的情况非常普遍，比如稽东镇的童家岭村都为李姓，杨宅村多为杨姓，王坛的坎上村为董姓，肇湖村为张姓，上王村为王姓等。这些村落人口比较多，宗族势力比较强，一般可以单独建社，或者成为一社的核心村落。而附近一些小村落，往往依附于这些大村，与它们共同结社。

社的领头人被称为“社首”。舜王庙会的社并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举办庙会时主要依靠社首发起募集资金，因此社首多是由当地有一定社会地位、经济能力和号召力较强的地乡绅、地主担任。社首主要承担庙会、巡会的组织、协调以及资金的募集工作。

“社”将民众划分为一个个单元，同时也象征着这一带各个村落或者村落联合之间对舜王庙会、巡会这一信仰象征资源的划分使用。排序和座次直接关系到不同社民众对这一信仰资源掌控和使用的优先权问题，排序在前、甚至成为头社的，拥有较大的话语权。为了避免纠纷以及达到能够获得普遍认同的公平性，这一带历来采取“神判”的方式，

即由各社社首在舜王神像前抽签决定社的座次。

“会”是庙会组织和表演的基本组织单位，会的首领称为“会首”。会往往以承担的工作或者表演的内容来命名，比如负责茶水的称为“茶会”，舞龙的称为“龙会”，放铙的称为“铙会”，表演黑白无常的则叫做“太平会”等等，以此类推，不胜枚举。平时，社与会并没有隶属关系，只有在庙会期间，两者才有上下级关系，会必须服从社的管理。社与下属会一般按照所在村落发生对应关系。社首的个人威望比较大，会与会之间发生矛盾，一般都由他出面解决。会要负责村民平时的排练、置办道具等事务，需要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在当地，会一般都有财产，比如会田或者会山。由入会农户按股分配，轮流耕作，轮到哪户就称为“当值”。

会与村落并不是严格对应的，会的大小数量和该村的经济力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一村一会，也可以一村几会，甚至几个村子合办一个会。绍兴虞舜文化研究会俞日霞老师曾对这一带解放前会的情况做过非常详细的调查。据他调查所得的不完全统计，到解放前夕，共有67个村落参与了会货的组织工作^{[6]114-164}。这些村落中一村5会以上的有3个，即王坛镇的上王村、稽东镇的上冯村和车头村。一村2~3会的有24个村落，集中在王坛、稽东两镇，其余是一村一会居多。

会的组织除了与村落的经济实力有关外，还和庙宇的距离有密切关系。离信仰圈的中心点舜王庙越近，认同感越强，参与的人数就越多，会货的质量就越高。联合办会多出现在上虞、嵊县等地，则说明在信仰圈边缘地区的参与程度远远及不上其中心地区。在庙会活动中，王坛稽东人常常以主人自居，而将嵊县、上虞、诸暨来的会称为客人。

会与社是当地民众自发组成的信仰性民间组织，但它仍是建立在地缘或者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且基本与村落单元相吻合，传统的社首、会长本身在家族内或者村落中就具有较高威望。因此，除了信仰的朴素情感之外，民众对会社组织具有天然的亲近感和归属感，这也是会社能够较为稳定存在、运转的重要原因之一。乡村公共空间是社会组织空间与地域空间的结合，具有一定边界的地域与稳定的群体组织以及群体活动，既是传统庙会空间的基本特征，也是其向现代乡村公共空间转型的基础。

2.3 归属意识：空间的内在精神

庙会具有很强的文化整合能力，它所形成的不

仅仅是一个拥有边界和社会群组的实体空间，同时汇集了庙宇、祭祀仪式、曲艺戏曲、民间手工艺以及其他诸多带有意识、情感信息的文化符号，以至于空间本身成为了记忆延续的标志。民众聚集在这里，因为血缘、地缘的维系，分享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沿袭着共同的生活模式。他们祭拜神灵，相互交往，表达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形成一致的社会舆论，进而对民众的伦理、价值观产生影响，形成一种具有规约性的空间向心力。归属感，就是对空间内基本精神活动和向心力的总体概括，即周而复始、经年累月，民众由于个人活动、经验积累和情感意向，对庙会空间所产生的情感依附和价值认同。

情感依附指的是长期以来，庙会作为一类特殊的民俗文化事象，在民众意识中所形成的心理印象与情感指向。绍兴当地俗谚说：“锣鼓响，脚底痒”，说的就是庙会期间人人都忍不住抛开手中的忙碌想去凑热闹的心情。“凑热闹”或者“赶闹忙”，是民众们参与庙会时的普遍心态。

旧时会稽山区交通闭塞，各个村落之间较为分散，民众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平时娱乐活动相对贫乏，许多民众一生的活动范围也不过方圆数十里之内。参加巡会或者赶庙会对他们来说是一次难得的盛事。庙会上，仪式活动，各类民族民间艺术表演，以及旗幡、服饰，色彩鲜艳、目不暇接，给人们带来强烈的感官刺激，内心的情绪冲击，庙会上极尽欢乐。

这种欢愉、热闹的气氛并不是舜王庙会独有的，几乎是庙会的共同特征。清代希溥《东关赛会竹枝词》记录了当时绍兴另一处五猖会的盛况，他说：“近日传闻哄盛会，各村男女尽欢心。三日前头早约船，亲邻搭品各欣然。茶烟伙食头家备，随带身边零用钱。画船衔尾赴东关，先问戏文有几班。会货游人齐麇集，堪称人海与人山。……农村男女几奔空，各自欢心意气同。政学工商各界子，成群结队乐融融”^{[8]215}。当时正值清末乱世，民间赛会依旧看客如潮，游人如织，引得学者不禁摇头叹息，“如期盛会实惊心，费却劳工多少金”^{[8]218}。

对庙会空间的情感依附不仅是有别于日常生活模式的情感体验，更重要的是民众心中的世俗欲望、渴求得以借此宣泄，重拾精神家园的安宁之感。这些情绪与诉求看似杂乱无章，实则浑然一体。各种代表生命个体基本诉求的利益、伦理观

念，伴随着强烈的情感意识，通过肢体、道具、造型、仪式、唱词等被直白地表现出来，祈求安全、长寿、发财、做官、避厄等心理交织在一起，这些观念并没有统一的逻辑或者道德标准，有的甚至互相矛盾。但这种混乱并不意味着与现实的割裂，它们都是从不同的生活经验和道德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并在日常生活的框架中逐渐沉淀、积累起来的。“它们还会被细细切分，组成为数众多，形式各异的结构性的纽带”^[9]。这些漂浮的“纽带”很多是观念上的，保留了基本的形态，却失去了彼此之间的秩序和排列，互相游离，又缠绕在一起，既混乱又自成一体。这种基于精神共振上的、混乱无序的诉求，充满着强烈的独一性或个体性特征，同时也将个体与空间牢牢束缚在一起。

情感依附的更深层次因素在于当地民众共同的心愿意识，即他们在祭祀活动、相互交往中对彼此的认同，并由此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这里所说的共同价值观不同于万物有灵、善恶有报的朴素信仰心理，更多的是对信仰中所体现的传统伦理观念、道德操守的认同和遵守。民间信仰在长期的传承发展中，经过历代王朝的改造，在儒家思想的渗透下，表现出鲜明的伦理化特征。在以教人行善为宗旨之下，忠孝仁义等传统儒家道德观念被视为评判善恶报应的主要标准，绍兴舜王信仰也不例外。

舜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在传统典籍的记载中，他是仁孝的代表，其孝感动天的故事被列为二十四孝之首。在会稽山区也流传着不少关于舜的孝行故事。尽管在那些舜王的故事中有嫁接、附会的痕迹，但孝行能感动天地、令神明赐福的观念确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民众心中。也正是因为舜对后母的极孝，他才能得到神明的眷顾，于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平安度过，一次次化险为夷。普通民众也正是从此类故事与传说中，点点滴滴积累起行孝善莫大焉的潜在意识与观念。

孝的价值观不断内化，沉淀为当地普遍认同的共同行为准则与社会舆论的导向标，能够对民众的日常生活和言行产生约束。“它不是靠明确的条文，而是靠人们习惯心理和群体力量来维系的，具有一种为例很强的惯性动力”^[10]。传统会社的组织者多为本地乡绅，他们深受儒学影响，视忠孝仁义为立身之德、光宗耀祖为己任，他们引导耕读传家，恪守儒家伦理价值观，为民众做出表率，也影响着民众一般的价值观。在民众眼中，“孝”就是对父母好，庙会中从来不乏为父母祈福、还愿的民

众, 评选孝子则成为近年来庙会活动的重头戏。

价值认同促使民众将自身与共同活跃于庙会空间内的人群共同体联系起来, 在与他人的交往、讨论中发现普遍的共识, 并以此为基础设定行为的准则, 对他人的行为与社会关系做出期待, 从而产生彼此之间的信任感。情感的依附则在此基础上不断强化个体与群体、人与空间之间的联系, 对特定空间的归属感也由此得以不断内化。

3 结论与问题

传统庙会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文化空间形态, 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典型代表。从地域上来看, 主庙与村庙的联结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实体边界; 就空间结构而言, 通过血缘、地缘关系缔结的信众组织定期举行仪式、表演等活动, 维系着空间的基本运行; 更重要的是, 当地民众对这一特殊文化事象与场所具有的归属意识赋予了空间特殊的情感指向与群体认同。

以上3点既是历史形成的, 又与现代空间观念不谋而合, 因此传统庙会所营造的公共文化空间既是历史、传统在当下的现实存在, 也具有面向未来的延展性与整合能力。增强传统庙会的文化辐射力, 促使其向现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转型, 特别是在城乡一体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 将能够发挥其内在优势服务于当下民众的精神文化需要。

传统庙会空间的现代转型将要面对诸多问题, 就空间结构而言, 首先便是传统会社组织的弱化与开放度的增加。乡村大量青壮年人口外出打工, 传统的村落组织以及宗族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日趋淡化, 凡此种种势必将进一步弱化传统会社组织在地域社会中的组织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 区域性较大规模的庙会活动, 往往被作为地方文化节等公共文化旅游项目, 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与推广, 因此它所面对的不再是均质而相对固定的“土著”民众, 而是来自临近城市甚至各地的观光客、摄影爱好者、文化研究者等等。随着地域限制被进一步打破, 空间的开放度大大加强, 传统庙会空间内同一性普遍化价值认

同也将面临现代个体多元化价值取向的挑战。换言之, 我们将从何种意义上重新定义空间之于现代文化建设的文化意义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事实上, 除去不再适应现代社会的一些观念, 传统庙会活动中本身也带有与人为善、和谐人际关系关系的普世性价值观, 特别是它所具有的文化整合能力与心理调适作用即便是在现代社会中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现代社会的文化生活的确丰富多彩, 但在某种程度上, 它也形成了另一种文化上的单调重复和贫乏, 现代人同样需要在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之外得到心灵释放的机会, 并在追寻如何定义自身中寻求新的归属意义。传统庙会所营造的文化空间中充满了各种带有传统意味、地域风格的文化符号, 这些文化符号汇集在一起代表了历史的延续和现实的存在, 从而延伸了现代生活平面, 为寻求归属感的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文化生活的选择和可能。“乡愁”的重构, 现代归属意识的重续, 将在一个新的意义上将个体的自由意识与传统文化认同、情感寄托捆绑起来。这也是以传统庙会为代表的公共文化空间现代转型与重构的重要维度。

参考文献

- [1] 王江涛.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6-20.
- [2] 曹海林. 村落公共空间演变及其对村庄秩序生成的意义: 兼论社会变迁中村庄秩序生成的逻辑[J]. 天津社会科学, 2005(6): 61-65.
- [3] 何兰萍. 公共空间与文化生活: 冀中平原N村调查[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7.
- [4] 刘铁梁. 作为公共生活的乡村庙会[J]. 民间文化, 2001(1): 48-54.
- [5] 岳永逸. 乡村庙会传说与村落生活[J]. 宁夏社会科学, 2003(4): 33-38.
- [6] 俞日霞. 绍兴虞舜文化研究[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 [7] 俞日霞, 俞婉君. 会稽山虞舜陵考[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80-81.
- [8] 裘士雄, 吕山. 越中竹枝词[M]. 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8.
- [9] 维克多·特纳. 仪式过程: 结构与反结构[M]. 黄剑波, 柳博赞,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96.
- [10] 陈勤建. 中国民俗学[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71.